

島田利吉在臺事蹟及其對金瓜石地區之影響

Rikichi Shimada's Deeds in Taiwan and his Influence on Chinkuashih Area

卞鳳奎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摘要

1895 年（光緒 21 年）中國與日本之間爆發甲午戰爭，中國戰敗，臺灣被迫割讓給日本，成為日本第一個殖民地。是年日人在臺灣開始殖民統治，在臺灣各地積極從事各種開發。由於臺灣北部地區生產金礦，因此有心從事此產業投資的日人或是日本會社，渡海來臺謀求機會，紛紛來到當地，帶動當地各種產業蓬勃發展，同時也造成當地的繁榮。本文係探討日人在臺灣殖民統治期間，奉日本鑛業株式會社的指派，來到臺灣開採金礦的島田利吉，他在臺灣面臨到何種困境；如何將臺灣產金事業推向高峰。再者，他在臺灣任職 5 年的期間，與臺灣百姓互動的情況，以及對金瓜石地區有何具體影響等，是本文企圖探討的問題。

關鍵字：島田利吉、黃仁祥、金瓜石、臺灣鑛業株式會社、金礦

Abstract

In 1895 (the 21st year of Qing Guangxu), the Sino-Japanese War broke out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China was defeated, which then caused Taiwan to be ceded to Japan and became Japan's first colony. In that year, the Japanese began to colonize and rule

Taiwan and actively engaged in various developments in Taiwan. Since gold ore was found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aiwan, Japanese people and their companies who were interested to invest in this industry came to Taiwan to seek opportunities, which led to the flourishing of various industries in Taiwan and the prosperity of local areas. In this article, we are going to discuss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Rikichi Shimada, who was assigned by the Japanese Mining Corporation to push forward gold mining in Taiwan during the colonial rule of Taiwan, and how he brought the gold production business in Taiwan to the peak. Furthermore, during his five-year tenure in Taiwan, how he interacted with the people of Taiwan and what specific influence he had exerted on the Chinkuashih region.

Keywords: Rikichi Shimada, Huang Ren-xiang, Chinkuashih, Taiwan Mining Corporation, gold mines

壹、前言

1894 年（清光緒 20 年）中日二國爆發甲午戰，中國戰敗，被迫於 1895 年（光緒 21 年）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將臺灣割讓給日本，成為日本第一個殖民地。是年日人在臺灣開始殖民統治，在臺灣各地積極從事各種開發。由於臺灣北部地區有產金礦，因此有心從事此產業投資的日人或是日本會社，為謀求機會，紛紛前來開採金礦，帶動當地各種產業蓬勃發展，也造成當地的繁榮。但由於日人來臺目的及其素質，參差不齊，總是讓被殖民的臺灣人，留下諸多印象。特別是日治時期盛產金礦的金瓜石地區，相關人物或會社，在當時發展的動態；以及所獲得的成果等，更是臺灣學者專家們研究的重要課題。¹ 但關於對金瓜石當地周邊建設以及影響等為議題，較少探討。是以，本文係探討日人在臺灣殖民統治期間，奉日本礦業株式會社的指派，來到臺灣開採金礦的島田利吉，他在臺灣面臨到何種困境；如何將臺灣產金事業推向高峰。再者，他在臺灣任職 5 年的期間，與臺灣百姓互動的情況，以及對臺灣有何具體影響等，是本文企圖探討的問題。

貳、在臺事蹟・奉派來臺

一、早期在臺日人樣態

1895 年（光緒 21 年）日人開始在臺灣殖民統治，此時的日本政府為了解決日本國內自明治時期開始，因快速人口成長所衍生的大量過剩人口問題，於是積極鼓勵日本國內人民來臺移民。對於過剩之人口，認為只須移民至中國大陸、滿洲（中國大陸東北）、朝鮮半島、臺灣、樺太等地，即可解決問題。² 不僅如此，更深信獎勵日本國內人民赴海外移民，造成當時移民的風潮。再者，就政治面而言，可宣揚日本「國威」，提升日本國際地位；就經濟面而言，移民者會將移住地所獲得之薪資報酬等，寄回日本使母國賺取大量外匯，³ 此為當時日本國內之人口政策及政府處理過剩人口之態度。日人渡海來臺的情況如何，可從日人在臺灣總計有七次之國勢調查內容中得知。從表 1 可看出在臺之日人歷次增加之現象，此說明日本統治臺灣時期對於日人渡海來臺移民的態度是非常積極的。

1 相關研究有；以金瓜石礦山的興替為題的研究，唐羽的論文最詳細，如〈黃金的歷史與金瓜石礦山的興替（上）〉《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學刊》第 6 期，2018 年 1 月，頁 6-23；〈黃金的歷史與金瓜石礦山的興替（中）〉《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學刊》第 7 期，2019 年 1 月，頁 6-29；〈黃金的歷史與金瓜石礦山的興替（下）〉《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學刊》第 8 期，2020 年 1 月，頁 5-29。探討金瓜石地區宗教論文，如張藝曦，〈日治時期金瓜石黃金神社與礦業發展〉《北縣文化》，第 95 期，2007 年 12 月，頁 82-96；駱淑蓉，〈礦山的祭典 -- 金瓜石山神祭的歷史研究〉《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學刊》，第 2 期，2014 年 1 月，頁 58-69。以綜論方式的探討，如莊珮柔，〈日治時期礦業發展與地方社會 -- 以瑞芳地區為例（1895-1945）〉（桃園中壢：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88 年）。另外，近年許多碩博士論文，以文化產業的視野，探討金瓜石發展可行性。如劉珮君，〈從礦產業到文化產業：濱海山區聚落金瓜石的變遷〉（基隆市：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99 年）。以金瓜石開發對當地社會影響為議題的論文不多，如駱淑蓉、張簡俗文，〈水金九地區的學校發展與地方社會〉《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學刊》第 7 期，2019 年 1 月，頁 82-99。因受限於篇幅，未能列舉之專書或論文，請見諒。

2 吉田忠雄，〈日本人口をめぐる平和的政策論議〉，收錄於南亮三郎、石南國編，《世界平合と人口政策》，1986 年，頁 48。

3 吉田忠雄，〈日本の人口政策の展開〉，收錄於南亮三郎編，《世界の人口政策と國際社會》，（千倉書院，1977 年 12 月），頁 45。

表 1、日治時期臺灣歷年人口數一覽表⁴

年別	總人口	本省人	外省人	日本人	朝鮮人	其他
1905 年（明治 38）	3,123,302	3,055,461	8,223	59,618	—	—
1915 年（大正 4）	3,569,842	3,414,388	18,225	137,229	—	—
1920 年（大正 9）	3,757,838	3,566,381	24,836	166,621	—	—
1925 年（大正 14）	4,147,462	3,924,574	33,258	189,630	—	—
1930 年（昭和 5）	4,679,066	4,400,076	46,691	232,299	—	—
1935 年（昭和 10）	5,315,642	4,990,131	53,900	269,798	1,604	209
1940 年（昭和 15）	6,077,478	5,682,233	46,190	346,663	2,299	93

註：本省人中之人口數含原住民。

但日治初期，渡海來臺的動機為何，這可從在當時擔任第二任總督桂太郎時代的臺灣法政局參事官，日後被任命為第 13 任臺灣總督的石塚英藏，在 1896 年（明治 29 年）7 月向日本總理伊藤博文提出之報告書中看出，其報告書云：

或謂臺灣官吏中無熟練、誠實、嚴正者，其根據之一為以軍政中之雜亂無章測斷現在，再則為以諸多收賄事件概評一般官吏社會，所言雖有過於誇張之處，然部份卻為事實。蓋臺灣官吏中，固然有以經營臺灣自任，決心理骨此地而前來者，然而有如下份子，亦為事實。

- 一、於內地無成為官吏之資格而改向此地取得任官之榮為目的者。
- 二、暫時成為官吏而以此身分達到發大財願望者。
- 三、以在俸祿及退休金上獲得提升為目的而前來者。
- 四、以儲蓄（或償還債務）為目的而前來者。
- 五、以在臺灣獲得職階晉升，而後轉任內地為目的者。

由此而觀，臺灣官吏之採用，於其出發點就有錯誤之處。以現今之狀態期望熟練、能幹、誠實之官吏前往就任，殆無異於待百年河清。⁵

從前揭報告可知，石塚英藏清楚的將日人據臺初期從日本渡海來臺者之企圖，表達的淋漓盡致，想要有熟練、能幹、誠實三者兼具的官員來臺灣協助推動政務，是非常奢望的。

確實，日人據臺之初，自以為已擠進列強之林。但實際上對於第一個殖民地臺灣之統治方法並不清楚。甚至於初期來臺灣者，多是背景雄厚，只是企圖染指臺灣者，弄得第三任總督、日後在日俄戰爭一舉成名的乃木希典也拿這些人沒辦法，氣得想要以一億圓賣給法國，這就是著名的「臺灣賣卻論」。乃木希典就曾對這些不當官員有如是的指責：

剿滅土匪固然是必要之事，但，更重要的急務在於剿滅官匪。⁶

⁴ 《臺灣省通志》卷二人民志人口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 61 年），頁 149-162。另外，日據時期外省籍人口，日人稱之為「華僑」，見前揭書，頁 154。

⁵ 伊藤金次郎原著，（財）日本文教基金會編譯，《臺灣不可欺記》（臺北市：文英堂出版社，2000 年），頁 206～207。

⁶ 伊藤金次郎原著，（財）日本文教基金會編譯，《臺灣不可欺記》（臺北市：文英堂出版社，2000 年），頁 204。

說明日人在臺初期的官界，可以說極端腐敗蕪亂，關說、包庇之事公然橫行，高官因收賄嫌疑而被逮捕並不是罕見之事。這是第三任總督乃木希典有感而發的諷刺之語，也可說是出自無奈的嘆息。

另外，日本據臺期間，擔任長達 8 年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對此亦有極深刻的體會。他認為在殖民地統治，最基層的官吏是不可缺少的，特別是從事治安工作的巡查一職，因此在臺政府非常積極的投入在日本募集巡查的工作，期望能藉由在臺灣所成立的巡查練習所，經由該所的設備訓練和培訓後，能擔任此重責大任，但當時來到臺灣的日人的表現，卻讓後藤新平大失所望，遺憾至極，他指稱：

起初招募巡查之時，是如何情況？巡查志願者從日本內地出發之際，攜帶著木匠、水泥匠等用具。進入巡查教育所學習，因犯錯而遭到遣散時，也不在乎，因為當初來臺灣時就是企圖以政府的錢做旅費而來，一旦遭到遣散，就以木匠、水泥匠為生，真是不成體統。⁷

描述從日本內地來臺者之樣貌，連日本人自身都無法認同他們來臺灣的目的。更遑論其他如在臺灣知識份子對這些日人來臺所留下惡質印象。⁸

二、奉派來臺・負責收購

但吾人以為，昔日渡海來臺的日本官紳，仍有相當多人，是懷有崇高的理念與理想，企圖在臺灣投入心力，建設臺灣，或是對地方建設積極貢獻，有些並與臺灣士紳維持友好的互動，或是對地方建設投入心力，且彼此之間均留下良好的印象。以下就日治時期在臺開發金礦事業的代表性人物島田利吉為例，說明他對於金瓜石金礦事業的開採成績、積極推動地方建設之成果等，作一說明和探討。⁹

根據昭和 12 年版之《臺灣人士鑑》，對於臺灣金礦事業貢獻卓著的島田利吉有如下的記載：

明治十七年一月一日出生於東京市，明治四十五年東京帝國大學工學部採礦科畢業，明治四十五年進入久原礦業株式會社工作，爾來在該會社工作多年，昭和四年被推舉為日本礦業株式會社常務取締役，昭和八年就任臺灣礦業株式會社；以及昭和十二年就任臺灣化學工業株式會社專務取締役至今日。¹⁰

記載日本東京都出生的島田利吉，於 1912 年（明治 45 年）畢業東京帝大採礦科。因成績優異，

7 後藤新平，《臺灣殖民政策一斑》（東京都：拓殖新報社，大正 10 年），頁 26。

8 洪以南從泉州返回臺灣之後，為了維持家業，認識一些早期來臺的日本人，其中也有一些不是很正派的日人。參見洪啟宗，〈從家傳文獻看洪以南的交友關係〉，《臺北文獻》第 166 期，民國 98 年 3 月 25 日，頁 202。

9 有關日據時期日臺官紳之交流與互動為中心之相關研究並不多見，目前筆者所見到者，是高野史惠，《日據時期日臺官紳的另外交流方式——以木村匡為例（1895-1925）》（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96 年度），但作者多著重木村匡在臺灣的各種活動為中心探討，與其他家族之間的互動較少探討；其他似乎多以近代通稱的臺灣五大家族為中心探討，其中又以霧峰林家史料與相關論著最豐富，例如黃富三所撰寫之《霧峰林家的興起：從渡海拓荒到封疆大吏（1729～1864）》等多種；板橋林家次之，如許雪姬，《板橋林家：林平侯父子傳》，（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 89 年）；以及許雪姬所撰〈日據時期的板橋林家——一個家族與政治的關係〉收錄於《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下冊）》（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印，民國 81 年）；基隆顏家有陳慈玉，《臺灣礦業史上的第一家族——基隆顏家研究》（基隆：基隆市文化中心，民國 88 年）；以及唐羽，《基隆顏家發展史》（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民國 92 年）分別為其撰寫家族史，鹿港辜家則比較少，多以近代為主，如司馬嘯青，《臺灣世紀豪門：辜振甫家族》（臺北市：玉山社，1998 年）；再如戴寶村在作高雄歷史相關研究時，因受到高雄陳家之委託，完成《陳中和家族史：從糖業貿易到政經世界》，（臺北市：玉山社，2008 年）一書，但各家族史的撰述中，對於與日本在臺灣官紳之間的互動以及影響等，多圍繞在維繫或拓展家族企業為中心的討論。

10 臺灣新民報編，《臺灣人士鑑》（臺北市：臺灣新民報社，昭和 12 年），頁 169。

畢業當年，旋即進入久原礦業株式會社工作。¹¹因工作勤奮努力，勇於任事，頗獲上級倚重，職務不斷晉升。昭和初年，久原礦業株式會社改組為「國策會社」¹²改組會社名稱，更名「日本礦業株式會社」。經過四年之後，島田利吉被擢升為該會社之常務取締役。¹³

1932 年（昭和 7 年），日本礦業株式會社屬意金瓜石礦山，開始在臺經營採金事業。1933 年（昭和 8 年）3 月，議成之後。同年四月，辦理交接，島田利吉旋即被派遣來臺，負責其業務，擔任事務取締役要職。¹⁴

可知，島田利吉在渡海來臺之前對於礦業方面，已有相當豐富的工作經驗，並非是一無所長，只是前來臺灣尋求機會。

三、堅持原則・解決問題

1932 年（昭和 7 年）八月，金瓜石礦山資本額由二百萬元，增資為一千萬元，易名「臺灣礦業株式會社」，島田利吉晉升該社之支社長。¹⁵但同時也開始面臨到重要待解決之問題。一是收購問

題，一是如何提升產量問題。

島田利吉於 1933 年（昭和 8 年）4 月來臺辦理收購事宜，但被「日本礦業株式會社」收購的後宮信太郎，卻做出讓各界極為不認同之舉，讓他面臨極大的挑戰，不得不親自解決此風波。¹⁶

後宮信太郎出生於日本京都府，1895 年（明治 28 年），當時僅有 22 歲之年齡就渡海來當臺灣發展。雖然臺灣尚處於日本殖民初期，社會動盪不安之狀況，但由於後宮信太郎對於開創事業有濃厚的興趣以及企圖心，本著即使遭遇到任何挫折也不屈服的精神，嘗試經營各種事業，並被推舉為臺灣煉瓦會社、高砂麥酒株式會社等多數會社之取締役。

由於他擅長向銀行借貸，1925 年（大正 14 年）在獲得臺灣銀行之後援，以二百萬元承接田中長兵衛開創的金瓜石礦山，¹⁷擔任社長，¹⁸擠進殖民地財界巨子之地位。1933 年（昭和 8 年）將採金事業推向最高峰，會社之純益高達百萬餘圓之盛況，¹⁹因此擁有「金山王」之稱譽。²⁰但由於自知無法

11 久原房之助(1869-1965)，山口縣人，慶義義塾大學畢業，曾籌組建森公司和藤田公司，1907 年在外相井上馨的支持下創辦久原礦業所，1912 年改稱久原礦業公司，1918 年成立久原商社，1928 年（昭和 3 年）當選眾議院議員，任田中義一內閣遞相（郵政大臣），1931 年任立憲政友會幹事長。久原財閥的源頭為向來有「礦山王」之稱的久原房之助，他在 1912 年設立「久原礦業所」，但因遭逢一次大戰後的不景氣而由其義兄鮎川義介將之改組而在 1928 年出資 5000 萬圓創立控股公司「日本產業株式會社」。到了 1937 年，該企業資本額高達 2 億 2500 萬圓，下轄 18 家直系企業跟 130 年旁系公司，主要事業除了日本礦業株式會社所代表的礦業外，還包括機械工業、化學工業、農林水產業，並且積極在臺展開以軍需工業為中心的事業投資。參見涂照彥著、李明俊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臺北：人間，1991 年），頁 335-344；朝尾直弘、宇野俊一、田中琢編，《日本史辭典》（東京：角川書店，2005 年），頁 313

12 國策會社是日本政府在戰前為拓展國勢或移民政策為目的；為能在海外占領地建立各項設施，因此成立法人機構「公社」來執行，因此有「國策會社」產生；如滿洲拓殖會社、台灣拓殖會社等組織。參見井出季和太，《南進台灣史考》（臺北市：南天書局，1995 年複刻版），頁 187-193；張素珍，〈國策會社與日本移民事業的開展--滿洲拓殖公社與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師大臺灣史學報》第 2 期，2009 年 3 月，頁 33-72。

13 唐羽，《臺灣礦業會志》（臺北市：中華民國礦業協進會，民國 80 年），頁 756-757。

14 《臺灣人士鑑》（臺北市：臺灣新民報社編，昭和 12 年），頁 169。

15 唐羽，《臺灣礦業會志》（臺北市：中華民國礦業協進會，民國 80 年），頁 756-757。

16 關於後宮信太郎做出許多令人非議之事，因此遭到輿論交責等社會風波。請參閱唐羽，〈黃金的歷史與金瓜石礦山的興替（下）〉《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學刊》第 8 期，2020 年 1 月，頁 5-29。文中有相當細膩的探討。

17 田中長兵衛去世之後，其事業處理人為田中清，當時擔任職務是「基隆金瓜石礦業所長」。參見《臺灣日日新報》「笠戶丸が齎した土產話の數々／金瓜石礦業所長 田中清氏」，1924 年（大正 13 年）3 月 29 日。

18 〈金瓜石礦山を繼承し 二百萬圓の會社創立 重役は後宮氏を始め島内事業家〉，《臺灣日日新報》，1925 年（大正 14 年）11 月 22 日。

19 〈金瓜石礦山會社總會 純益百萬餘圓〉，《臺灣日日新報》，1933 年（昭和 8 年）2 月 4 日。

20 唐羽，《臺灣礦業會志》（臺北市：中華民國礦業協進會，民國 80 年），頁 755-756。

與國策會社競爭的情況下，於是前往朝鮮金井礦山發展。但或許是具有「是一名擅於買賤賣貴的貨殖傳人物」個性，²¹ 在離去之際，引發勞資爭議；以及一件由二千萬圓交易所產生；如登錄稅、所得稅、附加稅等極大的風波。

後宮信太郎為逃避各種對其不利之責任，企圖藉由邀請有力人士；臺北州知事中瀨拙夫出面協調達其目的。²² 無獨有偶，正當島田利吉全力處理收購問題之際，日籍從業員也效尤後宮信太郎，聘請律師，出現圖利之不當想法。以及臺籍從業員揚言有臺籍礦工 80 名；甚至於將有千名礦工會與日籍從業員聯合，共同爭取權益。關於此事，《臺灣日日新報》有如下的記載：

金瓜石從業員爭議 結束唯內地人

日之丸館三樓金瓜石從業員爭議團本部。去二十三早以來。訪客雜沓。三代表忙於應接。據聞其後情況。

自二十三早以來。有憲兵隊、州南署方面訪客。與以合法的必成功之激勵詞。據日前山間電話現場益舉氣勢。激勵本部之奮鬥。當方則戒山間之輕舉妄動。又二十三早。有本島人二名。由山間到本部。囑欲合流。其背後有本島人職工八十名。萬一之時。則有千名之本島人蜂起。

及略同數之中華人。若使之加入此運動。或不可收拾。深慮散在山間之火藥庫。以是唯以最初之內地人二百名結束云云。

其態度平靜。又在北之太地、延岡、西崎三代

表、及古屋、生野兩代理於二十三日午後七時。招待新聞關係者。在鐵道旅館。開座談會。詳述事件發生以來之經緯。²³

但島田利吉為維護「日本鑛業株式會社」所擁有應有權益，不願意使問題陷入複雜，因此堅持不對後宮信太郎以及從業人員讓步，宣稱必會做出強烈之處置。在《臺灣日日新報》可看出其堅強的態度：

金瓜石礦山從業員爭議。頻如前報。由山間移本部于臺北。爭議委員五名中二名。尚留在山。充連絡之任。現下之處。別不出直接行動。在日礦一邊。

執靜觀態度。依是若果於業務有支障之時。則漏出欲斷乎彈壓之意。又職工等之手當積立支出要求運動。似未至表面化云。²⁴

為儘速讓後宮信太郎和解。1933 年（昭和 8 年）6 月 27 日，在由島田利吉等人為主導的臨時議員會議時，將後宮信太郎的經營團隊全員退出，²⁵ 自此由島田利吉所帶領的「日本鑛業株式會社」完全主導。同年 8 月，金瓜礦山由 200 萬圓增資為 1,000 萬圓，易名為「臺灣鑛業株式會社」，島田利吉晉升為支店長。²⁶ 雖然後宮信太郎最後還是被迫讓步，但卻也留下諸多是非。²⁷ 另外，從接收的過程，亦可看出島田利吉不願向後宮信太郎妥協，維護會社權益的堅持一面。

21 唐羽，〈黃金的歷史與金瓜石礦山的興替（下）〉《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學刊》第 8 期，2020 年 1 月。頁 17。

22 〈金瓜石の手當問題 今日日中に解決か 中瀨知事を調停役に 爭議團の要求額を容認せん〉，《臺灣日日新報》，1933 年（昭和 8 年）6 月 25 日。

23 〈金瓜石從業員爭議 結束唯內地人〉，《臺灣日日新報》，1933 年（昭和 8 年）5 月 25 日。

24 〈若業務有支障 斷乎彈壓 日鑛目下靜觀〉，《臺灣日日新報》，1933 年（昭和 8 年）5 月 25 日。

25 〈金瓜石鑛山重役更任〉《臺灣日日新報》，1933 年（昭和 8 年）6 月 30 日。

26 唐羽，〈臺灣鑛業會志〉（臺北市：中華民國鑛業協進會，民國 80 年），頁 757。

27 〈金瓜石鑛山の重役更任 日鑛側と總入替り〉，《臺灣日日新報》，1933 年（昭和 8 年）6 月 30 日。

四、產金事業・推向高峰

1933 年（昭和 8 年）4 月自後宮信太郎主持之金瓜石鑛山株式會社收買為主會社後，為讓金礦產業能夠順利推動，會社旋即擴充鑛山。有鑑於後宮信太郎時期所建的第一、第二選礦場，產能不敷所需，加上設備老舊，決定廢棄不用，²⁸ 另外選擇

十三層選廠於水湳洞山坡，場內包含碎礦工廠、磨礦場、氰化工廠，以及浮選工廠等，完全採取機械化作業，在當時，其技術水準可說是獨步國內外，十分先進。²⁹ 在運送方面，拆除金瓜石至煥子寮間的架空索道，另外興建水湳洞直達煥子寮的輕便鐵路。³⁰ 之後，更將鐵路延長到基隆八尺門的礦砂裝

表 2、日治時期九份、金瓜石產金量一覽表（單位：公分）

年代	九份	金瓜石武丹坑	合計	年代	九份	金瓜石武丹坑	合計
1898 年	9,184	41,329	50,513	1922 年	252,437	423,116	675,553
1899 年	38,777	122,288	161,065	1923 年	91,817	378,210	470,027
1900 年	40,500	346,579	387,079	1924 年	59,429	206,396	265,825
1901 年	42,236	582,836	625,072	1925 年	40,021	199,057	239,078
1902 年	85,762	861,293	947,055	1926 年	68,620	228,060	296,680
1903 年	150,693	809,756	960,449	1927 年	248,959	200,290	449,249
1904 年	539,126	1,209,771	1,748,897	1928 年	129,912	143,132	273,044
1905 年	506,208	974,651	1,480,859	1929 年	248,075	209,400	457,475
1906 年	363,053	997,180	1,360,233	1930 年	248,361	233,681	482,042
1907 年	330,813	866,370	1,197,183	1931 年	315,517	226,533	542,050
1908 年	280,061	1,329,592	1,609,653	1932 年	578,600	208,845	787,445
1909 年	250,447	1,329,138	1,579,585	1933 年	580,720	1,564,000	2,144,720
1910 年	347,846	1,242,134	1,589,980	1934 年	1,012,197	1,757,000	2,769,197
1911 年	337,064	1,298,535	1,635,599	1935 年	1,131,902	2,030,000	3,161,902
1912 年	355,419	1,209,576	1,564,995	1936 年	1,240,937	2,485,000	3,725,937
1913 年	230,550	865,213	1,095,763	1937 年	1,359,302	2,561,000	3,920,302
1914 年	352,446	1,574,828	1,927,274	1938 年	1,700,313	2,604,000	4,304,313
1915 年	650,637	994,428	1,645,065	1939 年	1,294,862	2,479,000	3,773,862
1916 年	693,773	745,023	1,438,796	1940 年	872,383	2,262,000	3,134,383
1917 年	789,135	754,042	1,543,177	1941 年	991,048	2,506,000	3,497,048
1918 年	273,493	514,481	787,974	1942 年	795,018	1,905,000	2,700,018
1919 年	237,493	332,112	569,605	1943 年	609,957	855,000	1,464,957
1920 年	199,295	354,871	554,166	1944 年	181,330	547,000	728,330
1921 年	381,547	494,715	876,262	1945 年	7,269	7,000	14,269

資料來源：陳慈玉，《臺灣礦業史上的第一家族：基隆顏家研究》，頁 9-10 製作。

²⁸ 張藝曦，《孤寂的山城》（臺北市：麥田出版，民國 96 年），頁 14。

²⁹ 陳斐翹撰文，《黃金城傳奇：金瓜石》（臺北市：秋雨文化出版，民國 93 年），頁 112。

³⁰ 蔡承豪，〈日治時期的礦業鐵路〉。參見國立臺灣圖書館網址：<https://www.ntl.edu.tw/public/Attachment/87131646535.pd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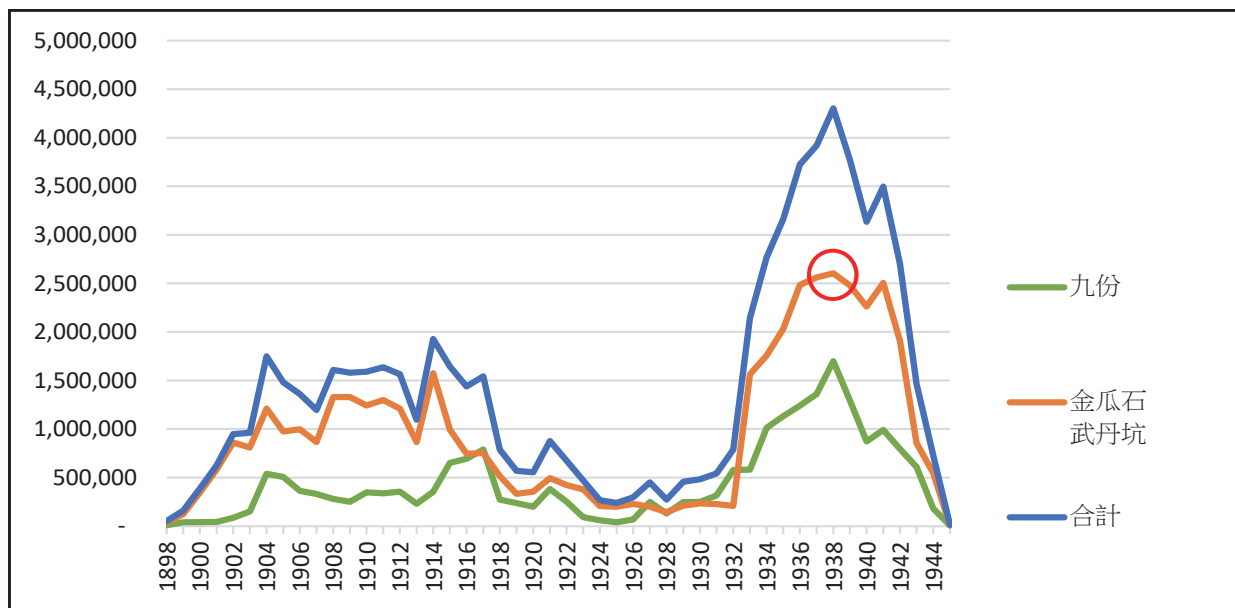


圖 1、日據時期九份、金瓜石產金量百分比圖（單位：公分）。圖中以紅色“O”註記是金瓜石金產量最高點。（資料來源：陳慈玉，《臺灣礦業史上的第一家：基隆顏家研究》，頁 9-10 製作。）

船廠，運至日本，³¹此即八尺門鐵路。以上更新設施，未及三年即告竣工。1935 年（昭和 10 年），金礦生產量破 2 公噸大關，銀 7.9 公噸，銅礦 6,000 噸。翌年，更投入開採。之後，在臺灣所獲得之金、銀、銅礦區，總計多達十四區，³²其下之從業員已突破 7,000 人。³³金瓜石因此享有「亞洲金都」之譽。³⁴將臺灣採金事業及成績帶到最盛之時期。

島田利吉之所以提升臺灣產金量，獲「亞洲金都」之美譽。除個人擁有專業背景以及堅持果斷的領導能力之外。在職場上願意員工互動，共同打拚，亦是其成功之道。例如曾擔任臺北州知事，之後被推選為臺灣電力會社理事的宇賀四郎，³⁵對同是東京帝大畢業的島田利吉的評語是：

島田啊！此人極為豪爽，採礦冶金是全日本第一。他並不是學者型的採礦人，而是和礦工一樣實際採礦，如此才名符其實得到日本第一的名號。³⁶

指出島田利吉雖擔任專務取締役，且自東京帝大名校畢業，但作為日本礦業株式會社在臺灣的代表，長年在臺灣努力從事採礦工作，總是願意站在第一線；除總攬各項社務，更能和礦工共同打拚，與一般所謂會社之重役者完全不同。這是因為全體社員視島田利吉如慈父般敬重，因此願意獻身，為會社的開發而努力以赴。³⁷如此才能創造出傲人的礦業成績。

31 陳斐斐撰文，《黃金城傳奇：金瓜石》（臺北市：秋雨文化出版，民國 93 年），頁 112。

32 唐羽，《臺灣礦業會志》（臺北市：中華民國礦業協進會，民國 80 年），頁 757。

33 〈本島に進出する「日本礦業會社」今後の活躍刮目に値す〉《臺灣公論》，第二卷第十一號，昭和 12 年 11 月，頁 5。

34 唐羽，《臺灣礦業會志》（臺北市：中華民國礦業協進會，民國 80 年），頁 757。

35 〈宇賀氏の理事就任 十二日に發令 免官の手續終了次第〉《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昭和 6 年）9 月 12 日；泉風浪，《人と閩》（臺北市：南瀛新報社，昭和 7 年 10 月），頁 76。

36 〈話題の人 日本一の金堀り 臺灣礦業專務取締役 島田利吉さん〉，《臺灣》（臺北市：臺灣通信社，昭和 9 年 6 月 16 日），頁 71。

37 〈本島に進出する「日本礦業會社」今後の活躍刮目に値す〉《臺灣公論》，第二卷第十一號，昭和 12 年 11 月，頁 5。

參、對金瓜石地區的影響

島田利吉雖是奉日本鑛業株式會社指示來臺從事採礦工作，並將臺灣採金事業推向高峰。但他不僅不以殖民統治者自居，在開採的過程中，能瞭解金瓜石當地臺籍民眾的需要，並出資協助，在當地留下美名。以下臚列數項說明。

一、增設學校・普及教育

臺灣自 1895 年（明治 28 年）開始成為日本殖民地，日本當局為方便統治權之行使，是以所有的教育措施是基於殖民地教育政策的要求而出發的。在此前提之下，臺灣人民則在教育上所受的是極大差別的不平等待遇。

例如，1895 年（明治 28 年）7 月，日本在臺當局即在臺北士林芝山巖開山聖王廟設立「芝山巖學堂」，目的為教授臺灣學童學習國語（即日語），為日本人在臺灣教學之開始。³⁸1896 年（明治 29 年）在臺北設立「國語傳習所」及「國語學校」。

前者主要為向臺灣人民實施以國語為主的初等教育，作為地方行政設施的準備。1898 年（明治 31 年）改稱「公學校」，以區分專為日本人開設的「小學校」。³⁹二者內部資源相差極大，降低與在臺日人子弟競爭的機會，⁴⁰不僅臺籍人士不滿，就連在公學校任教的老師亦深有同感。在金瓜石地區就有因為謀求公學校學生福利，向當地政府提出建議，獲得島田利吉樂於協助的案例。

從下表可看出，由於金礦產量的增加，日人在此地更是積極開發金礦事業，提供了工作機會，帶動了就業人口的移入。例如以戶數為例，從 1930 年（昭和 5 年）的 5,111 戶，經過 10 年之後，到了 1939 年（昭和 14 年），增加為 13,609 戶，大幅增加 2.6 倍之多。再如，就人口數來看，1930 年（昭和 5 年）當地總人口數是 25,687 人，但經過 10 年後，至 1939 年（昭和 14 年），總人數增加至 58,907 人，也增為 2.2 倍之多，成長速度相當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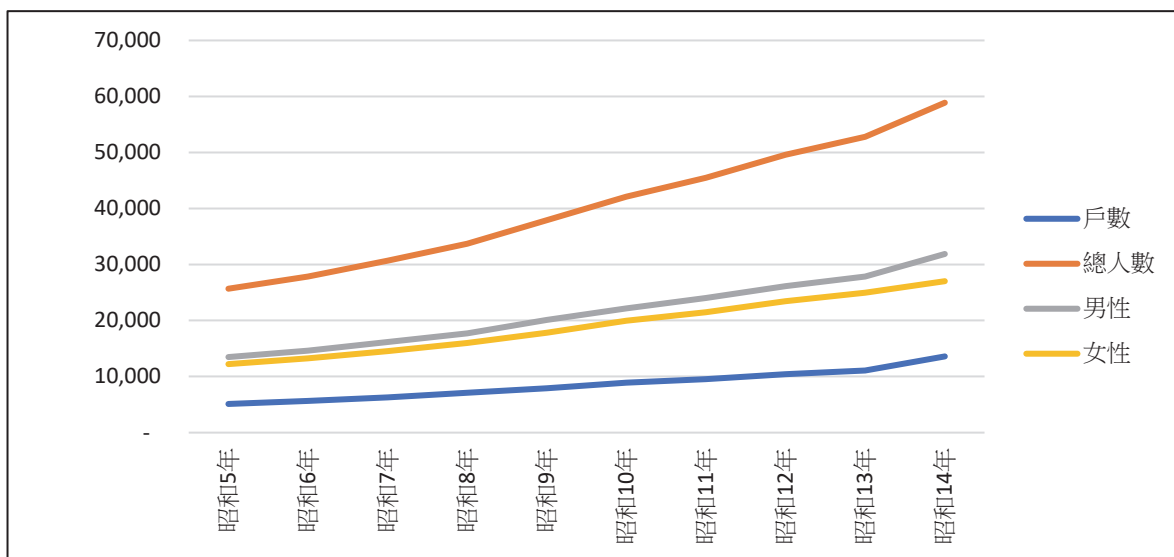


圖 2、瑞芳人口分類及成長圖。（資料來源：臺北州總務部總務課編，《臺北州統計書》，各年。）

³⁸ 《臺北市志卷七教育志教育行政與教育篇》（臺北市：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編印，民國 77 年），頁 42。

³⁹ 《臺北市志卷七教育志教育行政與教育篇》（臺北市：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編印，民國 77 年），頁 47-49。

⁴⁰ 有關對日治時期臺灣的小學校教育與公學校教育遭受不公平待遇，提出批判的討論。請參閱上沼八郎，〈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臺灣留学生—同化政策と留学生問題の展望—〉，（國立教育研究所紀要，第 94 號，1978 年，頁 133-157）。

表 3、瑞芳人口一覽表（昭和 5 年至昭和 14 年）

年	戶數	總人數	男性	女性
昭和 5 年	5,111	25,687	13,476	12,211
昭和 6 年	5,635	27,854	14,605	13,249
昭和 7 年	6,260	30,681	16,165	14,516
昭和 8 年	7,097	33,690	17,698	15,992
昭和 9 年	7,886	37,918	20,099	17,819
昭和 10 年	8,907	42,110	22,145	19,965
昭和 11 年	9,525	45,490	24,023	21,467
昭和 12 年	10,425	49,584	26,130	23,454
昭和 13 年	11,069	52,785	27,830	24,955
昭和 14 年	13,609	58,907	31,882	27,025

資料來源：臺北州總務部總務課編，《臺北州統計書》，各年。

其次，隨著聚落的擴展以及人口的遷入，亦影響每戶兒童人口數的增加，之後兒童的就學問題，亦是家長們所必須面臨的問題。以金瓜石公學校為例，從下表可看出，1930 年（昭和 5 年）學校總學生總數僅 215 人，但到了 1939 年（昭和 14 年），學生人數增加為 1,268 人，成長了 5.8 倍之多。可見臺籍小學生就學率普及的現象。

表 4、金瓜石公學校歷年學生人數表（昭和 5 年至昭和 14 年）

年	總數	男生		女生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昭和 5 年	215	156	72.5	59	27.5
昭和 6 年	288	211	73.2	77	26.8
昭和 7 年	358	265	74.0	93	26.0
昭和 8 年	406	302	74.3	104	25.7
昭和 9 年	528	382	72.3	146	27.7
昭和 10 年	612	436	71.2	176	28.8
昭和 11 年	790	563	71.2	227	28.8
昭和 12 年	989	681	68.8	308	31.2
昭和 13 年	1,037	664	61.8	373	38.2
昭和 14 年	1,268	801	63.1	467	36.9

資料來源：臺北州總務部總務課編，《臺北州統計書》，各年。

隨著當地產業之發展帶來聚眾的擴大；以及學齡兒童的增加。在班級數大幅需求的情況下，使得日本在臺政府有計畫的提升當地學校之班級數。

雖然金瓜石地區金、銅礦業的興起，促使外地人口往此地聚集，但早期還沒有可供本地兒童接受現代教育的地方。1907 年（明治 40 年）金瓜石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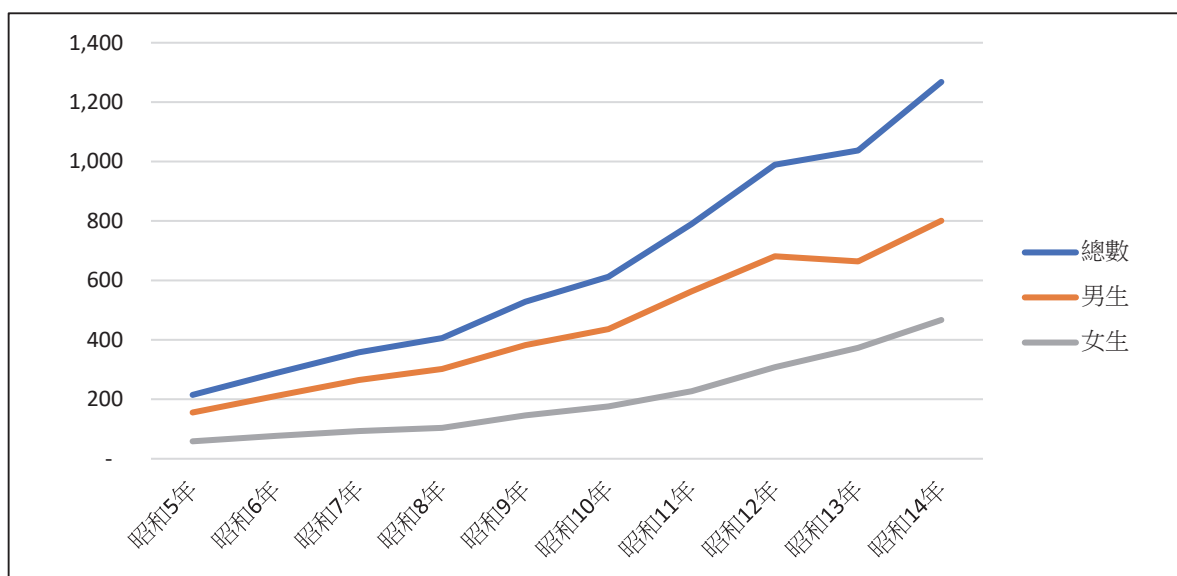


圖 3、金瓜石公學校歷年學生總數及男女個別人數成長圖。（資料來源：臺北州總務部總務課編，《臺北州統計書》，各年。）

常高等小學校成立，只是提供日本小孩能就讀的小學校，因此金瓜石地區的臺籍兒童想要上學，就必須步行到瑞芳公學校去就讀。直到1918年（大正7年）3月，日本政府才在瑞芳公學校之下設置「金瓜石分校」。但是，金瓜石分校的編制只到初等科四年級，若想要繼續修習高年級課程則必須到瑞芳公學校就讀，來回時間就需要3小時，當時幾乎無人能夠持續到畢業。1922年（大正11年）3月，金瓜石公學校正式獨立，全校編制只有3班，另轄有鼻頭分教場1班。⁴¹

日本在臺政府為解決公學校班級數不足之問題，於是自昭和8年春季開始，大幅增加班級數。根據1933年（昭和8年）2月11日的《臺灣日日新報》，以「增減學籍」為題，有以下的報導：

瑞芳庄各小公學校，現正募集新生，來年度豫定增減學級表示如下，九分公增一，金瓜石公增二，鼻頭分增一，計增四學級。減級校，瑞芳公一，四腳亭一，計二學校。但瑞芳公學校，自新年度起，增設國語講習所一，結局各校學級數四腳亭公四，瑞芳公八，九分公八，金瓜石公七，鼻頭分一，瑞芳小二，金瓜石小三，總數三十四學級云。⁴²

從前揭各日本學童就讀的小學校，以及臺籍學童就讀的公學校，其增減數可看出預定要增班之學校是九份公學校與金瓜石公學校，當中金瓜石公學校增加2個班級，增加班級數最多。另外，國語（日

語）講習所也增設7個班級之多，此可看出當地產業及商業蓬勃發展之下，帶動人口快速之增長，就讀小學之學童人數亦隨之迅速成長，同時也需要培訓通曉日語的臺籍人士。此亦說明當地積極展現出蓬勃發展的狀況。

其次，對於臺灣子弟所就讀的公學校，亦開始提供相當大的協助。以金瓜石公學校為例。日治時期，金瓜石地區的臺籍子弟都就讀於仁誠學堂，⁴³到1918年（大正7年）3月，設立「瑞芳公學校金瓜石分教場」，以舊仁誠學堂為教室；1920年（大正9年）4月，改隸稱為「九份學校金瓜石分校」；1922年（大正11年）3月，獨立為「金瓜石公學校」，學校初設時，校舍簡陋，僅足以遮蔽風雨，但到了1933年（昭和8年）日本鑛業株式會社來到金瓜石經營採礦業，規模漸大，人口由原先數十名遽增到三百多人，校舍場地乃成為問題。

瑞芳公學校金瓜石分校籌備之時，黃仁祥曾擔任該校之學務委員總代一職，對金瓜石的校務發展以及捐款事宜，盡心盡力，並頗有成績，深受各界好評。⁴⁴之後又擔任家長會長，見到學校遭遇困難，於是偕同平時對學校之臺籍學生極為照顧，⁴⁵當時擔任第四任校長赤瀨川棊，⁴⁶懇請鑛業所長島田利吉協助，並獲得同意，於是乃於砂礦製鍊場遺址興建新式校舍，此也是今日瓜山國小所在地。⁴⁷1933年（昭和8年）2月11日的《臺灣日日新報》以「瑞芳／校地移轉」為題，有以下的報導：

41 鍾溫清總主編，《瑞芳鎮誌 教育篇》（臺北縣瑞芳鎮：臺北縣瑞芳鎮公所，民國91年），頁29。

42 〈增減學籍〉《臺灣日日新報》，1933年（昭和8年）2月11日。

43 根據張璦文的調查指出，日治初期在九份大竿林有一個漢學堂叫「新民學堂」，由吳如玉先生教漢學。它分日夜各一班，共兩班，學生有二、三十人，大部分是年紀較大的失學者。日班和夜班上課方式不一樣，日班採個別指導，及「點書」，每一個學生念不同課本，由老師分別點批一段，再回座位自己念，夜班也是使用同一本教材上課。仁誠學堂興建時間以及上課方式是否亦同，有待進一步考證。參見張璦文計劃主持，《九份口述歷史與解說資料彙編》（臺北市：文建會，民國83年），頁106。

44 〈金瓜石開校式〉《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大正7年）5月14日。

45 張藝曦，《孤寂的山城：悠悠百年金瓜石》（臺北市：麥田出版，2007年），頁56-59。

46 赤瀨川棊早年在臺北擔任八芝蘭等公學校，之後來到金瓜石，擔任四任校長。對公學校教育資源的不足，應很瞭解。

47 鍾溫清總主編，《瑞芳鎮誌 教育篇》（臺北縣瑞芳鎮：臺北縣瑞芳鎮公所，民國91年），頁28-29。

「校地移轉」瑞芳庄金瓜石鑛山會社。將來豫定作業工程。及大製鍊所建築計畫。郡於去月三十日總會時，經諸主同意決定。而昨年下半年成績，因單水下落，金銀銅價騰貴與賣礦量增加關係比前期增收四十二萬圓之利益金。是故此番再向該山旗堂腳一帶，及現在金瓜石公學校校地，以鑛山會社，支出經費，移轉問題，向庄當局，交涉結果，訂八年度起，移轉工事興工，郡將二處敷地架設大製鍊…。目下為敷地整理，日役人夫二百餘，按本月中全部告完云。⁴⁸

報導指出因由島田利吉所負責的鑛山株式會社，盈收比去年豐富，增收 42 萬圓之利益。為能回饋當地住民和百姓，經由會社總會股東之同意，決定將金瓜石公學校校地遷移他處，所需之相關經費均由瑞芳庄金瓜石鑛山會社支付。且該遷移校地之時程，訂定昭和 8 年（1933 年）度起，從遷移校地的速度可看出，每日動用 200 餘工人積極趕工，預定該年 7 月可完工，顯示該會社回饋當地住民百姓是相當有誠意。

關於島田利吉捐贈學校改建學校宿舍，以及所捐贈之經費為多少等問題。根據 1935 年（昭和 10 年）1 月 28 日的《臺灣日日新報》以「島田氏美舉 寄附八萬餘圓」為題，有以下的記載：

島田氏美舉 寄附八萬餘圓 基隆郡瑞芳庄金瓜石鑛山自歸日鑛會社買收以來，極力整頓，人口增加，現達萬餘人，為是同地金瓜石公學校舍，及職員宿舍建築問題，同會社金瓜石鑛山事務所島田利吉氏日前對宮川瑞芳庄長聲明寄附八萬三千六百圓，為建築費。去二十二日庄協議會時，附議於各議員，俱感心島田氏之美舉，目下工事進行中，按夏季中能得完竣云。⁴⁹

從前揭的記事可清楚瞭解到，瑞芳庄金瓜石鑛山自歸日鑛株式會社接收後，發展迅速，人口亦隨之增加，已多達萬人以上。金瓜石鑛山事務所島田利吉為協助金瓜石公學校校舍改建工程，於是捐贈八萬三千六百圓，此舉受到瑞芳庄協議員衷心之感謝。



圖 4、今新北市瑞芳區瓜山國民小學為日治時期金瓜石當地臺灣孩童就讀的唯一公學校。（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48 〈瑞芳／校地移轉〉，《臺灣日日新報》，1933 年（昭和 8 年）2 月 11 日。

49 〈島田氏美舉 寄附八萬餘圓〉，《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昭和 10 年）1 月 28 日。

由以上數則新聞報導可知，島田利吉所負責的臺灣礦業株式會社，經營有方，盈收豐富，獲得相當高的利潤。但同時對於當地學童就讀學校之發展帶來正面的助益。其中最具體的展現就是對金瓜石公學校的拓展與建設，是以對當地的教育，有功不可沒的影響。

二、捐資建廟·安定民心

臺灣民間信仰承接中國大陸傳統，關公崇拜起自明鄭時期，現在臺南的關帝廟，就是建於 1668 年（永曆 22 年），是過去道府祭祀的所在，規制極為完備。⁵⁰ 根據阮昌銳研究指出；明清以來，臺灣陸續興建的廟宇約 140 餘所，其中關帝廟以宜蘭、臺南、苗栗等地最多，最古老的廟卻在臺南市。武廟（祭典武廟），與開基武廟均建於鄭氏領臺時期，祭典武廟為清代地方官吏春秋二祭武聖之所，

由於官方的致祭，故其規制較其他武廟為備。目前關帝廟中香火最盛的可能是臺北市的「行天宮」，俗稱「恩主公廟」。⁵¹

瑞芳瓜山區主要人口結構是以漳州人為主，⁵² 由於此地區的礦業者或礦工信奉神明以關聖帝君居多，⁵³ 因此，瑞芳金瓜石地區信徒所興建之關聖帝君寺廟稱為「勸濟堂」或「恩主公廟」或「祈堂廟」。該廟創建於 1896 年（明治 29 年），為中國固有傳統道教之聖廟。⁵⁴ 建廟之初，僅有一座神壇，位於金瓜石石尾（本山露頭），供奉關聖帝君神位，這是勸濟堂之前身。當時是由私人管理；由於神威顯赫，庇佑住民安居樂業，因此信徒日益增加，遂成為金瓜石地區的主護神。但由於位處偏遠，離住民較遠，使得人們上山參拜深感不便。⁵⁵

表 5、1928 年基隆郡漢人鄉貫別人口統計（單位：百人）

鄉貫別		福建省										廣東省					
行政區 安溪		泉州府			漳州府	汀州府	龍巖州	福州府	興化府	永春州	小計	潮州府	嘉應州	惠州府	小計	其他	總計
		同安	三邑														
基隆郡	萬里庄	2	1	-	80	-	-	-	-	-	83	-	-	-	-	-	83
	金山庄	-	-	-	101	-	-	-	-	-	101	-	-	-	-	-	101
	七堵庄	85	1	37	-	-	-	-	-	1	124	-	-	-	-	-	124
	瑞芳庄	96	6	1	100	-	-	2	-	-	205	1	-	-	1	-	206
	貢寮庄	-	-	-	135	-	-	-	-	-	135	-	-	2	2	-	137
	雙溪庄	5	-	-	135	-	-	-	-	-	140	-	-	-	-	-	140
總計		188	8	38	551	0	0	2	0	1	788	3	1	3	7	29	791

資料來源：《臺灣在漢籍民族鄉貫別調查》（臺北：臺灣總督府官防調查課，1928 年），頁 10。

⁵⁰ 林普易、李添春等著，《臺灣宗教》（臺北市：眾文圖書，民國 84 年），頁 483。

⁵¹ 阮昌銳著，《傳薪集》（臺北市：臺灣省立博物館，民國 76 年），頁 96-97。

⁵² 由表中可以知道瑞芳地區的漢人祖籍分布情況，瑞芳 1928 年（昭和 3 年）的漢人鄉貫泉州人與漳州人的比例約各半。泉州人的祖籍中分別有安溪、同安以及三邑等三地，人數分別是 96、6、1，以安溪人佔多數。此外瑞芳的漳州居民有 100 人，總人數與瑞芳的泉州人 103 人人數相近。但若仔細分析可知，瑞芳的泉州人並不是均勻的分布在全區，而是在分布屬於基隆河沿岸的地區。漳州人則主要居住在瓜山地區。參見莊珮柔，〈日治時期礦業發展與地方社會 -- 以瑞芳地區為例（1895-1945）〉（桃園中壢：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88 年），頁 103。

⁵³ 莊珮柔，〈日治時期礦業發展與地方社會 -- 以瑞芳地區為例（1895-1945）〉（桃園中壢：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88 年），頁 165。

⁵⁴ 勸濟堂編印，《勸濟堂簡介》。

⁵⁵ 勸濟堂編印，《勸濟堂簡介 興建與沿革》。

廟方為解決此參拜不便問題，1899 年（明治 32 年）經瑞芳地區之信徒協議，在水管頭上面的赤牛仔寮，擇地另興建一草堂，號為乩堂（祈堂），敬奉廟中奉祀了關、呂、張、王（關聖帝君、孚佑帝君、司命真君、豁落靈君）四大恩主為主神，開始扶鸞濟世，⁵⁶ 從此改為信徒管理，當時的創辦人為黃家昆仲（黃仁祥兄弟）。⁵⁷

1900 年（明治 33 年）仲秋，經奉玉旨賜號，正式定名為「勸濟堂」，以「勸眾行善，濟危扶困」為堂旨。黃春於翌年 1901 年（明治 34 年）前往廈門購買鸞書分給信徒，善書印行是聯絡信徒與拓展信仰最重要方法，善書的宣講對庶民道德價值觀的確立不可忽略，早期常民識字率不高，善書的內容，透過廟宇雕刻、廟公說書、士紳宣講傳播。⁵⁸ 勸濟堂所印製之善書《如心錄》元、亨、利、貞四部，宣化勸善，使得地方振興文風、挽救頹俗，⁵⁹ 從此香火日益鼎盛。但因草堂過於狹隘，無發容

納眾多信徒膜拜，於是於 1902 年（明治 35 年）廟方進行第二次修建，並遷至今址，⁶⁰ 興建規模較大之莊嚴廟宇。⁶¹

1925 年（大正 14 年）後宮信太郎承包金瓜石礦山，擔任「後宮礦業會社」社長，並主持該礦業會社。⁶² 臺灣產金事業受到日本國內政治黃金政策息息相關，⁶³ 當然也影響到後宮信太郎在金瓜石的金礦開採事業。1931 年（昭和 6 年）以後，日本政府特別重視金礦之生產，⁶⁴ 後宮信太郎為擴充業務，於 1931 年（昭和 6 年）在廟宇的右下方整地籌建製鍊廠，致使原有的廟基之地層滑動而發生整個廟宇龜裂，於是被迫全部拆除。在地方士紳黃仁祥、簡深淵⁶⁵ 等人的發動下，鼓勵各界善信踴躍捐獻建廟。當時改建聘請廖石城負責工程策劃與設計，其規模依指南宮格局建造。⁶⁶ 因此得於在今址重新改建後殿和前殿兩邊附建的辦公室、禪房、廚房及妙後的花園。

表 6、勸濟堂修建沿革（1895 年-1945 年）

修建時間	內容	管理方式
1896 年（明治 29 年）丙申	建神壇，恭奉關聖帝君	私人管理
1899 年（明治 32 年）己亥	遷址興建草堂，號為乩堂（祈堂），第 1 次遷址	信徒管理
1900 年（明治 33 年）庚子	號「勸濟堂」，以「勸眾行善、濟危扶困」為堂旨	信徒管理
1902 年（明治 35 年）壬寅	遷於今拜亭位置，規模更為莊嚴，第 2 次遷址	信徒管理
1931 年（昭和 6 年）辛未	廟基龜裂，黃仁祥、簡深淵、游阿秋發起捐獻建廟	信徒管理
1934 年（昭和 9 年）甲戌	啟動新建工程	信徒管理
1935 年（昭和 10 年）乙亥	改建完成，環境優雅，冠稱於臺灣北部宗教聖地	信徒管理

資料來源：根據勸濟堂編印，《勸濟堂簡介 興建與沿革》、《勸濟堂碑誌》整理。

⁵⁶ 有關扶鸞的意思，請參見王見川，《臺灣的齋教與鸞堂》（臺北市：南天書局，1996 年），頁 199-220。

⁵⁷ 勸濟堂編印，《勸濟堂簡介 興建與沿革》。

⁵⁸ 王慶臺計畫主持，《金瓜石勸濟堂》（臺北縣板橋市：臺北縣政府文化局，2004 年），頁 22。

⁵⁹ 參見《勸濟堂碑誌》。

⁶⁰ 現址是新北市瑞芳區金瓜石銅山里祈堂路 53 號。參見勸濟堂編印，《勸濟堂簡介 興建與沿革》。

⁶¹ 陳斐翹撰文，《黃金城傳奇：金瓜石》（臺北市：秋雨文化出版，民國 93 年），頁 93。

⁶² 唐羽，《臺灣鑛業會志》（臺北市：中華民國鑛業協進會，民國 80 年），頁 755。

⁶³ 唐羽，《臺灣採金七百年》（臺北市：錦綿助學基金會，民國 74 年），頁 140-141。

⁶⁴ 臺灣銀行金融研究室編，《臺灣之金》（臺北市：臺灣銀行金融研究室，民國 39 年），頁 86。

⁶⁵ 簡深淵於 1899-1900 年到金瓜石當承包業的工人，替黃仁祥工作，經營臺灣鐵道株式會社有關的事業。參見《臺灣官紳年鑑》，頁 197。

⁶⁶ 王慶臺計畫主持，《金瓜石勸濟堂》（臺北縣板橋市：臺北縣政府文化局，2004 年），頁 18。

勸濟堂改建工程歷時4年，1935年（昭和10年）竣工。廟宇為三間二進的傳統建築，其坐南朝北的坐向。背靠茶壺山，前有內九份溪流入海，在群山環抱之下，地理位置優美。⁶⁷從此廟貌煥然一新，環境優雅冠稱於臺灣北部的宗教聖地。

值得注意的是，1934年（昭和9年）發啟改建勸濟堂時，慷慨捐獻者，除是由重新建築委員黃仁祥、簡深淵、游阿秋三人主持募款；⁶⁸另外，根據勸濟堂所建之《勸濟堂碑誌》記載捐獻者當中，除臺籍士紳或是會社代表之外，另有臺灣鑛業株式會社金瓜石鑛山專務取締役島田利吉同意捐獻金參千圓，捐款數額僅次於黃仁祥金四千參百八拾八圓。碑誌內容如下所示：

竊觀夫欲創久遠之事，必有立久遠之志；欲立久遠之志，必建立久遠之謀；能建立久遠之謀以後，方能成久遠不朽之業也。溯自前己亥年，先兄黃從、（黃）春建設本廟，稱曰「勸濟堂」；自為擔任，毘勉從事。當時係屬初創，茅舍草堂僅堪容膝。幸藉神光，遐迩崇仰、香火接踵、志士摩肩，遂著「如心錄」勸世，頒行內外；振文風、挽頹俗，亦曰有可裨益于世道人心耳。至壬寅年，又卜地於茲，再立規模。前後雖曰二次建修，而斯時構造簡易，均無畫棟彫樑、山節藻梲之雅觀；歷今已逾數十星霜，係先兄黃從、（黃）春伯仲獨自維持之力也。然爾後猶幸當鑛山月計年累，得山川之精氣、洩至寶以無窮、依此時勢之勃發，深得當事者俱表同情，荷為玉成促進改造，以為地方之壯觀。故以甲戌年二月繼承兄志，不惜巨資重新建築，幸得告竣；雖壯麗幽邃無可冠於全島，而鍾靈毓秀亦不亞於他方。尤願群樂輸誠、共投巨款，得今日有可以瞻仰者，

亦賴集腋成裘之志也。願此後之樂善者奮力繼起，冀得同垂久遠不朽之業者，深為厚望焉耳。茲謹將寄附者芳名臚列於左。

昭和十式年歲次丙子孟秋上浣，黃仁祥敬題。
臺灣鑛業株式會社金瓜石鑛山專務取締役島田利吉金參千圓。

黃仁祥金四千參百八拾八圓也。

金益昌代表簡杖梨金壹千五百圓也。

金豐公司代表吳阿和金壹千圓也。

簡深淵請負部工人一同昭和九年度金壹千圓也，基隆輕鐵會社金四百圓也，黃仁祥請負部工人一同昭和九年度金參百參拾四圓也。

中央運搬工人一同昭和八年金參百圓也。

合成金吉發代表吳根元金六拾圓也。

黃 春金壹千圓、王振發金四百圓、周大條金五拾圓

黃慶雲金壹千圓、游阿秋金參百圓、陳夜臨全黃榮宗金壹千圓、吳烏秋金式百圓、游阿片全黃慶輝金壹千圓、黃天松金壹百圓、游文獻全黃德昌金壹千圓、何文超金壹百圓、楊明發金四拾圓

簡深淵金壹千圓、鄭樹林金壹百圓、吳井金壹百圓

簡 盛金壹千圓、游石枝金八拾圓、黃阿清金參拾圓

簡連子金壹千圓、林清風金六拾圓、游觀發全吳金在金五百圓、簡 王金五拾圓、陳捷陞全⁶⁹

關於勸濟堂方面的調查研究，已有相當多的專家學者書寫和討論。但對於島田利吉為何會對當地寺廟的認同，捐贈龐大的金額，討論的不多。個人以為，似因：

⁶⁷ 王慶臺計畫主持，《金瓜石勸濟堂》（臺北縣板橋市：臺北縣政府文化局，2004年），頁37。

⁶⁸ 參見《祈堂廟／如心錄（二）》。網址：<https://blog.xuite.net/lucy6071/twblog/300713128>。

⁶⁹ 參見《勸濟堂碑誌》。

（一）照顧員工不分國籍

島田利吉於 1933 年（昭和 8 年）4 月來臺，擔任日本鑛業會社在臺負責人。經過 5 年的時間後，讓日本鑛業株式會社能累積巨資。但他毫無私心，會社的獲利不佔為己有，而是與員工分享。例如，與合併後宮鑛山株式會社時，將獲利金 10 萬圓，贈予由會社社員組織的「清交會」5,000 圓；以及會社勞務者組織團體「溫交會」10,000 圓，作為對員工的福利。⁷⁰對於臺籍員工亦是如是。例如，關於島田利吉無私之處事風格，唐羽，《臺灣鑛業會志》有如下的書寫：

利吉旅臺，間約五年，任國策會社主，奉其政令，推行生產。唯對所屬，仍能徇民意，循風俗。…

指出島田利吉雖然是國策會社所屬機構任職，推動採鑛生產工作。但對於屬下員工仍能聽取意見，順應當地風俗。他清楚知道，勸濟堂是臺籍鑛工在當地民間信仰所寄託之寺廟，信徒多是在日本鑛業會社工作之員工。為能增進對會社員工的互動；讓會社員工精神有所寄託，願意捐贈龐大金額。

（二）對黃仁祥處事能力的認同

另外，唐羽，《臺灣鑛業會志》，對於島田利吉捐獻勸濟堂一事，亦有如下的書寫：

十二年，黃仁祥修建勸濟堂，所祀神為地方精神寄託。利吉亦捐多金，助其成。…

前揭文字的書寫，看出島田利吉捐資修廟，應與黃仁祥有密切之關係。個人以為勸濟堂創辦人之一，黃仁祥對於當地廟宇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力。他長年熱心於地方事務，關心當地民眾生活。日本鑛業株式會社需要工人在鑛坑挖鑛，黃仁祥即承攬招募工人的工作，在金瓜石神社處開雜貨鋪，待人和善。⁷¹與鑛工互動頻繁，他在瑞芳成設立「苦力頭店」，⁷²不僅是以謀利為目的，經常照顧臨時應聘工人的起居，頗得地方人士敬重，漸漸成為地方施善者；日人更聘任為基隆瑞芳庄之方面委員，⁷³其善行如興建醫院、⁷⁴捐米救濟貧戶、⁷⁵排解眾人糾紛⁷⁶等，已被眾人視為在瑞芳地區具有影響力的領導階層人士。島田利吉為拉攏金瓜石當地臺籍員工，當然不可忽略黃仁祥在當地的重要性。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1933 年（昭和 8 年）3 月，後宮信太郎在金瓜石所經營的鑛山，雖將其鑛業讓渡給日本鑛業株式會社，同年 4 月島田利吉來臺辦理交接。⁷⁷未料後宮信太郎卻不願支付稅金；以及員工遣散問題。讓島田利吉自 1933 年（昭和 8 年）4 月至 6 月 27 日，迫使後宮信太郎和解止。其間應是他在臺灣任職所面臨最艱鉅的問題；並

70 〈本島に進出ちる「日本鑛業會社」今後の活躍刮目に値す〉《臺灣公論》，第二卷第十一號，1937 年（昭和 12 年）11 月，頁 5。

71 張藝曦，《孤寂的山城：悠悠百年金瓜石》（臺北市：麥田出版，2007 年），頁 76。

72 苦力(coolie)音譯，流行於日據時期，指從事鑛山、碼頭之勞動工人，負責包工者即為「苦力頭」，亦稱「頭家」，日人則稱「飯場長」。參見唐羽，〈北臺人物傳：附碑傳資料〉《臺北文獻》（直字）第 76 期，民國 75 年 6 月，頁 115-194。

73 〈瑞芳／救助貧民〉，《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昭和 10 年）1 月 8 日。「方面委員」制度意指委託民間慈善家或府市町村的官吏或州市街庄的慈善家擔任「方面委員」，該委員為名譽職，負責一定的區域，在所負責的區域內，調查居民的生活狀態，以審查出有救助需求者，給予適當的保護處置，使其生活改善向上，此種設置委員從事社會調查與保護指導的救護制度，稱為「方面委員」制度，又稱為「方面事業」參見李禮仁，〈日治時期高雄州社會事業「方面委員」制度的實施軌跡（1923～1938）〉《高雄文獻》第 2 卷第 4 期，2012 年 12 月，頁 72。

74 〈基隆博愛醫院成績優良〉，《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昭和 4 年）6 月 2 日。

75 〈基隆郡下施米〉，《臺灣日日新報》，1930 年（昭和 5 年）2 月 4 日

76 〈金瓜石爭議團解決 本島人團二千二百名 若扣起辯護士禮車資 每人實收四十六錢〉，《臺灣日日新報》，1933 年（昭和 8）1933 年 7 月 2 日。

77 唐羽，《臺灣鑛業會志》（臺北市：中華民國鑛業協進會，民國 80 年），頁 757。

且，給他製造莫大的難題的不是臺灣人，而同是臺灣總督府所支持的日本商人，相信他對後宮信太郎留下極不佳印象。但他在 8 月就任臺灣鑛業會社支店長之前，黃仁祥所代表的勞工團體，委請臺籍律師蔡式穀⁷⁸和谷口、沼田二位日籍律師，強烈要求後宮信太郎應分配股息及資遣費給勞工，並獲得其讓步，俾勞工日後能專心工作。此舉讓島田利吉認識到臺灣勞工代表義不容辭照顧勞工，努力以赴，向後宮信太郎爭取應有權利的堅持一面。對此，應該也留下深刻的印象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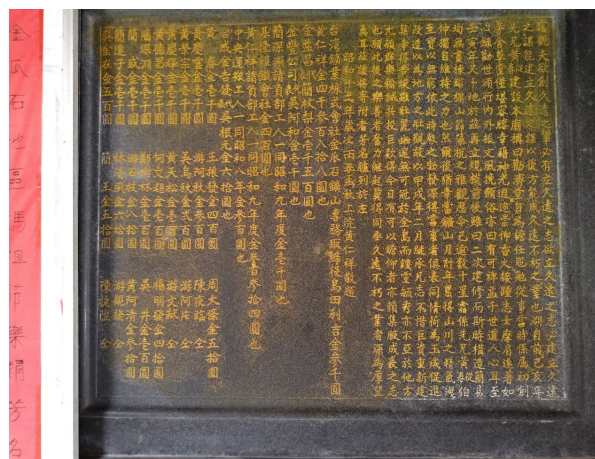


圖 5、勸濟堂碑誌。（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三、種植櫻花・綠化社區

清康熙年間，因與在臺灣的明鄭處於敵對關係，清廷為防止明鄭與對外的各種活動，以及杜絕大陸沿海對臺灣鄭氏的接濟，下令執行「遷界令」，嚴禁江、浙、閩、粵各省的人民出海。⁷⁹俟清朝政府解除禁令後，閩、粵人民開始積極移民臺灣。他們移進臺灣的時候，為能祈福避邪，會臨時建一座草庵，將神像供奉在草庵中。倘若日後經濟情形穩定之後，會進一步修整。⁸⁰其中，臺灣的土地廟規模大，全臺有 400 餘座，為全省居第四位的神廟。倘若，加上沒有登記的小祠，和民間俗稱的「田頭田尾土地公」及守墳的后土在內，則無法計數。土地公地位雖低，但與民間生活最為密切，因此，也是民間最普遍的神明。⁸¹



圖 6、深受遊客喜愛的勸濟堂廟宇。（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金瓜石聚落形成初期，從閩、粵渡海而來的移民就在山區小道旁，臨時蓋了簡單的土地公廟，其

中最具規模的是「福山宮」。關於建廟確實時間，根據福山宮所立之《福山宮神苑重整紀念碑》有如下的書寫：

⁷⁸ 蔡式穀，1884 年（明治 17 年）4 月 4 日出生於新竹市。1903 年（明治 36 年）7 月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乙科畢業，1907 年（明治 40 年）7 月普通文官考試合格，1908 年（明治 41 年）8 月止在新竹公學校任訓導。自 1909 年（明治 42 年）12 月至 1912 年（明治 45 年）3 月止，在桃園公學校任教諭。以後前往東京，1913 年（大正 2 年）7 月明治大學專門部法律系正科畢業。1923 年（大正 12 年）2 月律師考試及格，同年 5 月在臺北市太平町開設律師事務所至今。其間投入於政治、社會運動，歷任文化協會理事、文化協會臺北支部主任、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理事、臺灣民眾黨顧問、自治聯盟常務理事、自治聯盟臺北支部常務理事等。其他有擔任臺灣律師協理、臺北律師會常議員。1935 年（昭和 10 年）11 月參加臺北市會議員選舉，以最高票當選臺北市參事會員。1944 年（昭和 14 年）再度當選市會議員。參見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興南新聞社，昭和 18 年），頁 88。

⁷⁹ 松浦章，《近世東アジア海域の帆船と文化交渉》（大阪：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2013 年），頁 89。

⁸⁰ 宋序，收錄於卓克華著，《從寺廟發現歷史－臺灣寺廟文獻之解讀與意涵》（臺北市：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頁 1-2。

⁸¹ 阮昌銳，《傳薪集》（臺北市：臺灣省立博物館，民國 76 年），頁 121 - 122。

福山宮神苑重整紀念碑

夫青山麗水，寶地之風景依然；丹嶂高崖，神宮之雲旂尚在。此昔人所建之勝蹟，可資我輩重遊；而我輩雖不能光大前人，亦應保其舊觀也。

本宮建自前清道光戊申年，其時為發見礦藏之初，來本山淘採黃金者始建小型之宮，以供同仁參拜。後因日人割據臺灣，乃大開此山寶藏，因而人口日繁，撮爾山村成為富庶之境。至民國二年，居民又再擴建前、後兩殿及左、右兩廂；本宮之巍峩，在當時可為全臺之冠。迨民國三十一年，日人島田利吉氏捐贈櫻花苗百株，種植四圍，迄今已三十年矣。而花木已拱，種花之人亦老，礦山之黃金亦淘採殆盡矣。惟此花不因世事滄桑變其青蒼之節，每屆春來，依舊花開似錦；惜當年未作防風設備，每值颱風，即有數株被損，殊可惜也！火旺有鑒於斯，不忍前人之手澤日漸湮淪，乃自為發起人，又得本地居民沈錦春、簡瑞枝、林登發、劉祿、劉春、陳阿章、簡萬金、林燦庭諸善士，以義勞捐獻；並聯合李氏義方居、李建川、李建和、李儒聰、李儒侯諸先生共同捐款，重整此神苑及防風牆，以保護所有花木，俾不再受損於颱風，是所至望焉！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中秋

發起人

曾火旺 建立

姚德昌 撰書。⁸²

可知福山宮建於清道光戊申年；亦即 1848 年（道光 28 年）。當時廟宇坐落在崙仔頂稜線上的福山宮，最初只是一座長、寬各約兩公尺的小廟。

⁸³1895 年（明治 28 年）日本殖民臺灣以後，是此地採礦鼎盛時期，採礦工從各地蜂擁而至，創造當地繁榮的經濟，香火日加鼎盛。⁸⁴為答謝土地公的神恩惠賜，1913 年（大正 2 年）居民又再擴建前、後兩殿及左、右兩廂；本宮之巍峩，在當時可為全臺之冠。⁸⁵但由於山區多雨，廟宇所用木石的建材，難擋歲月侵蝕。1935 年（昭和 10 年）起，由臺陽礦業株式會社九份礦業所所長翁山英發起整修大殿，並增建兩側廂房。廟內雕樑畫棟，美麗動人，為當地增添色彩。⁸⁶

以上是福山宮在日治時期的發展經過。值得注意的是，根據鍾溫清總主編《瑞芳鎮誌 宗教禮俗篇》，記載 1935 年整修大殿之後的民國 31 年，亦即 1942 年（昭和 12 年），島田利吉贈櫻花苗百株，種植四圍。另外，根據唐羽在《臺灣礦業會志》指稱島田利吉於 1942 年（昭和 12 年）「…並由其國移來櫻花苗，遍山種植。」⁸⁷是一致的。但島田利吉為何從日本移植櫻花到當地，卻無說明。這似因受到日本在臺政府推動臺灣都市計劃的影響。

1895 年（明治 28 年）日本殖民臺灣，但百事待興。地方財力尚不充裕的情況下，各項建設工作尚屬於基礎建設，仍有未逮之處，以首善城市之臺北市為例，境內道路之修築，仍須仰賴國庫及州費之補助。⁸⁸直到 1937 年（昭和 12 年）以後臺灣總督府降低國庫及州費之補助，並開始徵收都市計畫

⁸² 參見《福山宮神苑重整紀念碑》。

⁸³ 陳斐翹撰文，《黃金城傳奇：金瓜石》（臺北市：秋雨文化出版，民國 93 年），頁 84。

⁸⁴ 鍾溫清總主編，《瑞芳鎮誌 宗教禮俗篇》（臺北縣瑞芳鎮：臺北縣瑞芳鎮公所，民國 91 年），頁 21。

⁸⁵ 陳斐翹撰文，《黃金城傳奇：金瓜石》（臺北市：秋雨文化出版，民國 93 年），頁 84。

⁸⁶ 鍾溫清總主編，《瑞芳鎮誌 宗教禮俗篇》（臺北縣瑞芳鎮：臺北縣瑞芳鎮公所，民國 91 年），頁 21。

⁸⁷ 唐羽，《臺灣礦業會志》（臺北市：中華民國礦業協進會，民國 80 年），頁 757。

⁸⁸ 越澤明著、卞鳳奎譯，《臺北的都市計畫——一八九五——一九四五 日據時期臺灣的都市計畫》《臺北文獻》直字第 105 期，民國 82 年 9 月，頁 133。

稅，市的財源才開始較為充裕。⁸⁹ 之後，臺北市的建設工作更多樣化；如綠地的興建或是文化工作的推動等；而新的道路配置比舊的道路更寬闊，並同時決定向郊外延伸，奠定日後臺北市向東區發展的基礎。

瑞芳金瓜石地區的發展過程亦是如此。日治時期，金瓜石地區掀起淘金熱，人們蜂擁而至，在此形成重要聚落。但昔日當地百姓為謀求生活，只關注於金礦的開採；以及當地產業與經濟的繁榮。綠地的興建與推動，卻是忽略未被注意。但島田利吉深知採金事業的發展雖然重要，但社區的綠化工作，對當地住民身心有益，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工作。因此願意出資，特從日本運送櫻花來此種植，美化當地。

從福山宮前種植的櫻樹此舉亦可看出，島田利吉全力投注在它所負責的臺灣鑛業會社開採的同時，對於社區的美化；以及對當地居民真誠照顧，亦未曾忽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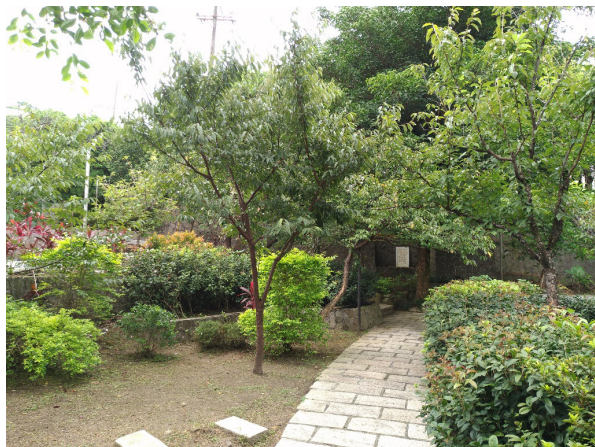


圖 7、福山宮前之園林。（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圖 8、福山宮神苑重整紀念碑。（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四、小結

臺灣北部產金，日本殖民臺灣後積極在此從事採礦事業。島田利吉所屬的日本鑛業株式會社，於 1933 年（昭和 8 年）3 月取得採礦權後，同年 4 月奉派來臺主持會社業務，至 1938 年（昭和 13 年）奉命調往滿洲鑛山株式會社，擔任社長，在臺灣約有 5 年時間。在職期間，他擴充礦區，廢除昔日開採技術，敷設運送鐵路，大幅增加產金量，讓金瓜石享有亞洲金都之美譽。但成功的背後，所面臨後宮信太郎為規避舊屬遣散費；以及稅金等爭議，處境陷入困擾。但他秉持堅決的信念，毅然決然。最後終於讓後宮信太郎讓步，其礦業產權順利完成交接。足見他擁有處事果斷，決不退縮的成功基本個性。

⁸⁹ 越澤明著、卞鳳奎譯，〈臺北的都市計畫——一八九五——一九四五 日據時期臺灣的都市計畫〉《臺北文獻》直字第 105 期，民國 82 年 9 月，頁 139。

日本鑛業株式會社雖屬國策會社，其經營策略是以殖民式經營為手段。但島田利吉在臺灣任職期間，除能奉行政令，推動採金事業之外，對於屬下照顧有加，讓員工願意全力以赴投入工作，創造會社優良佳績。再者，他從不以外來統治者自居，能夠諮詢民意，順應當地風俗。是以他願意捐獻巨資，協助勸濟堂整修廟宇，讓當地信徒精神有所寄託。其次，他也關心礦區員工子弟教育，見校舍不足或設備簡陋等問題，均願意撥款協助。再者，他為能美化金瓜石地區的環境，特從日本移植櫻花花苗，在當地種植，提升綠化。以上善舉，都可透過當地的碑誌，或是昔日的報紙的報導瞭解。在日本殖民統治臺灣的 50 年當中，能擁有如此事蹟者，實在值得介紹出來。